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英汉 比较与翻译

English-Chinese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董晓波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英汉比较与翻译

**English-Chinese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董晓波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比较与翻译 / 董晓波著.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3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ISBN 978-7-5663-0548-0

I. ①英… II. ①董… III. ①英语 - 翻译 - 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9566 号

© 2013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英汉比较与翻译
English-Chinese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董晓波 著

责任编辑: 董 黛 陈 欣 王晨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北京市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19.25 印张 445 千字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0548-0

印数: 0 001 - 3 000 册 定价: 35.00 元

出版说明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市场上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日渐增加，尤其是不同专业领域的翻译人才越来越受到青睐。许多高等院校开始重视专门用途英语（ESP）课程的开设，商务英语、法律英语、科技英语、旅游英语和新闻英语等，成为重要的 ESP 课程，也越来越受到相关专业学生、普通英语专业中有志于从事相关专业翻译学生的青睐。

为适应新的教学需要，满足社会对专业翻译人才的教学培养需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这套“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内容涵盖商务、法律、旅游、新闻、科技等各个方面。它不仅能满足翻译专业人士的需求，同时可作为全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选修课教材，翻译专业（本科、硕士）必修教材，也可以作为英语学习爱好者自学的专业读物。

本系列教材的作者均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学科带头人和一线优秀教师，充分体现了当今专门英语翻译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具体书目包括《实用商务英语翻译》、《实用法律英语翻译（英汉双向）》、《实用科技英语翻译（英汉双向）》、《实用旅游英语翻译（英汉双向）》、《实用新闻英语翻译（英汉双向）》和《法庭口译》等。

本套系列大部分教材配有 ppt 电子课件，具体情况请登录 www.uibep.com 查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外语图书事业部

2013 年 6 月

序

著名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1988）曾说过：“翻译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语言学学科，它研究两科语言的对比规律……任何一种翻译……都要靠两种语言的对比。”可见，对比是翻译理论的核心。翻译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建立在英汉两种语言异同对比的基础上。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的不同，英汉两种语言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少的差异，这就给翻译工作者带来不少的挑战。而翻译实践告诉我们：对双语研究得越深刻，对原文理解越准确，运笔自觉性也越高，从而真正做到胸有成竹，下笔有神。因此，可以说英汉对比研究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了解并掌握好英汉语言、文化上的共性和异性有助于提高翻译的质量。

从翻译实践看，汉语和英语不仅在语言上存在差异，两种语言使用者在思维、认知、文化以及价值观上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通常会在词汇、语义、语法和语篇层次上表现出来，给语言转换造成困难。翻译是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间的转换。但也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翻译活动既要考虑到翻译目的，也要考虑翻译的效果。翻译工作者在加强本族语水平的同时，有意识进行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对比，有利于减少和消除英汉互译的障碍。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学习翻译，实际上就是学习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学习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文化的转换。

本书的突出特点是注重英汉对比分析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兼备，从全新的角度——微观、宏观结合，宏观为主，微观为辅，对比英、汉两种语言、思维、尤其文化的异同，在比较的基础上谈翻译，并介绍常见翻译技巧运用的动因和实施方式，将双语知识转化为有力的方法论工具，帮助学习者处理和预测各种翻译问题，深化对翻译技巧的认识，提高翻译技能。

本书的阅读对象是大学英语专业翻译本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翻译工作者。凡是正在从事翻译或有志于翻译工作的人，学习本书后，能对翻译的一些基本规律有所了解，有所遵循，从而获得教益。即提高自己的应用翻译能力和跨文化翻译处理技能。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研究生华黎、张浙、傅瑶、王璐、杨自秀、周嘉慧、侯环环、蔡玲丽等曾为我搜集资料、整理书稿，并在我指导下，写出部分章节的初稿，对她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力求完美，但由于水平所限，不乏疏漏和欠妥之处，恳请广大同仁和读者不吝指正，以臻完善。

董晓波
2013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概述	1
翻译的概念与本质	2
翻译的标准与原则	5
翻译的分类	10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素质与权责	12
第二章 英汉词语比较与翻译	17
英汉词义对比与翻译	17
英汉词语构词法对比与翻译	25
第三章 英汉句法对比与翻译	33
英汉句子结构对比与翻译	33
英汉句子语序对比与翻译	39
长句翻译	43
第四章 英汉语篇比较与翻译	53
英汉语篇的构成	53
英汉语篇手段对比	54
英汉语篇翻译	60
第五章 英汉成语比较与翻译	67
英汉成语民族文化内涵对比与翻译	67
英汉成语对应问题与翻译	76
第六章 英汉颜色词比较与翻译	83
英汉颜色词词汇比较	83
英汉颜色词文化内涵比较	87
英汉颜色词翻译技巧	93
第七章 英汉动物词比较与翻译	101
英语文化教学中的动物喻词	101

英汉动物词的文化内涵比较·····	108
英汉动物词的语义构成比较·····	110
英汉动物词汇喻义相似性比较·····	111
英汉动物词翻译方法·····	113
第八章 英汉修辞对比与翻译 ·····	115
英汉修辞对比·····	115
英汉具体修辞手法对比与翻译·····	118
英汉修辞翻译方法·····	129
第九章 文化、思维与翻译 ·····	133
文化与翻译·····	133
中英思维方式与英汉互译·····	145
第十章 英汉文化意象比较与翻译 ·····	153
文化意象的内涵与理解·····	153
英汉文化意象的比较·····	158
英汉文化意象的翻译·····	164
第十一章 英汉委婉语比较与翻译 ·····	173
委婉语概述·····	173
英汉委婉语比较·····	182
英汉委婉语的翻译方法·····	187
第十二章 英汉外来词比较与翻译 ·····	191
英汉外来词来源比较·····	191
英汉外来词的原因·····	194
英汉外来词的类型及翻译·····	195
第十三章 英汉称谓语的功能比较与翻译 ·····	205
英汉称谓语的功能比较·····	205
英汉称谓语的翻译策略·····	213
第十四章 英汉文体差异与翻译 ·····	223
文学文体翻译·····	224
科技文体翻译·····	231
新闻文体翻译·····	238

商务文体翻译	244
法律文体翻译	251
第十五章 英汉翻译方法概述	265
直译与意译	265
英汉翻译常用技巧	271
参考文献	293

第一章

翻译概述

《晏子春秋·内篇》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我国已故文学泰斗季羨林（2007：11）先生在谈到翻译必要性时说到：“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这似乎说明翻译只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下下策”，无法让不同地域的人品尝到地道的“橘味”。

但是，在回答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为何没有在时间的流里消逝时，季老（2007：10）说到：“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这就是说，汉语在历史上主要受到了两次外来语言的冲击（新水注入），而这两次依靠的载体都是翻译。第一次是始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从印度来的水）；第二次冲击是从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运动的西方文化（从西方来的水）。在季老先生看来，虽然翻译是跨文化交流中一种无可奈何的补救方法，但是翻译曾经在促进汉语文字发展，保持中华语言文化的大河奔流不息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所以翻译必不可少，其作用无法替代。

而今，世界各国各民族联系日益紧密，跨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我国文化贸易逆差依然显著。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版权贸易金额为37391.3万美元，出口仅为3758.2万美元，进出口逆差比接近10:1。巨大的文化劣势不仅体现在版权贸易方面，也遍及其他跨文化智性实践领域。当“情人节”、“丘比特”在中国家喻户晓之时，又有多少外国人听说过中国的“七夕节”和“月老”？当国人沾沾自喜地将“梁祝”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抑或将某水城称为“东方威尼斯”时，五千年中华文化在与欧美文化的全球化竞争中已然落后。毕竟，一个只出口电视机，而不是出口电视节目的国家，还未能站在世界强国之巅。当前这种文化逆差的成因固然受制于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但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手段，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更是跨越文明鸿沟、实现异质文化转换、更新本土文化的再创造。

要想更好地进行英汉翻译实践，尽最大可能地保存“异域橘子”的“原汁原味”，我们首先要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1. 什么是翻译？
2. 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
3. 翻译有哪些不同的分类？
4.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具备哪些素质？

本章将就以上问题一一进行论述。

翻译的概念与本质

学习和研究翻译，首先就要对翻译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了解其性质。

翻译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伸缩性，无论是商务信函的英汉语转换，还是一首古典诗歌的意境在另一语言中的“再创造”，都属于翻译的范畴。由于翻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曾经对翻译的性质进行过不同的界定，给翻译下过很多定义，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在关于翻译的概念本质问题方面依旧没有定论。I·A·Richards曾说：“翻译可能是宇宙演化过程中发生的最复杂事件。”（王克友，2008：1）

一、翻译的性质

在给翻译下定义之前，我们先要理解“翻译”（translation）这个词的意思。汉语的“翻译”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所指：第一可以表示一种抽象概念，如“他的主攻方向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二可以表示一种活动，表示进行翻译的过程，如：“他每天都在搞翻译”；第三可以表示一种“产品”，即翻译活动的结果，如“他对这篇文章的翻译不满意”；第四可以表示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者，如“他是一名资深翻译”。

同样，英语的“translation”在不同语境下也有不同的内涵。罗杰·贝尔（Roger·T·Bell）（1911：13）在其专著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中认为，“translation”一词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

（1）Translating（翻译过程）：the process to translate; the activity rather than the tangible object（进行翻译的过程，是活动本身而不是有形的物体）；

（2）A translation（译作）：the product of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e. the translated text)（翻译过程的产品，即译语文本）；

（3）Translation（翻译）：the abstract concept which encompasses both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the product of that process（一个包含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抽象概念）。

因此，汉语的“翻译”与英语的“translation”所涵盖的意义基本是一致的。通常情况下我们所指的“翻译”都是一种抽象概念，而对这种通常意义的翻译的性质，中外学者在不同时期也有迥异的想法。

刘重德（1998：1）在《文学翻译十讲》中借鉴中西方学者的说法，给翻译这样综合定性：

1. Translation is a science.（翻译是一门科学。）

2. Translation is an art. (翻译是一种艺术。)
3. Translation is a craft. (翻译是一件工艺品。)
4. Translation is a skill. (翻译是一种技能。)
5. Translation is an operation. (翻译是一个运作过程。)
6. Translation is a language activity.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
7. Translation is communicating. (翻译是一种交际。)

季羨林(2007: 17-19)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翻译是一门科学,有他自身的规律”。而林语堂(1895-1976)在他的《论翻译》一书中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的成功取决于译者的艺术天赋和足够的训练”。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林语堂与《论翻译》,2011)刘重德(1998: 12-13)说:“翻译不仅是一门具有其自身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

二、翻译的定义

《辞海》对翻译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一位法国翻译工作者说:“翻译就是理解,并且让别人理解。”(Traduire, c'est comprendre et faire comprendre.) (许渊冲, 1984: 1)伴随翻译理论实践的深入发展和翻译批评的日益兴盛,中西译界对于翻译的理解不断加深,对于翻译的定义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

(一) 中国学者对翻译的定义

翻译活动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从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佛经翻译开始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我国佛经翻译元老玄奘曾云:“翻也者,如翻锦绣,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在季羨林(2007: 3)看来,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绣),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而自此之后,中国译界对于翻译的定义不尽相同。

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 [唐] 贾公彦(618-907)《义疏》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的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

— 张培基(1983)《英汉翻译教程》

在我看来,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这种再现不是机械地逐字对译,而是原文“意美”的再创造。

— 许渊冲(1984)《翻译的艺术》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是传播学中一个有特殊性质的领域。

— 吕俊(1997)

“翻译是跨语言(cross-linguistic)、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交际活动。”

— 陈宏微(1998)《汉英翻译基础》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正确无误地、恰如其分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去的创造性活动。

—彭卓吾(2000)《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

所谓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语言转换过程或结果。

—祝吉芳(2004)《英汉翻译方法与试笔》

广义的翻译指语言与语言、语言变体与语言变体、语言与非语言等的代码转换和基本信息的传达。狭义的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忠实地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杨莉黎(2004)《英汉互译教程》

翻译总体上是把一种语言在其固有语境中所表达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转换和文化阐释活动。

—杜争鸣(2008)《英汉互译原理与实践》

(二) 西方学者对翻译的定义

从广义上来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3至2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3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赛罗》。由此可见,西方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学者们也在不断赋予翻译新的内涵。

Transl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 (翻译就是将口头符号用其它语言表述出来。)

—Jakobson, 1959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fer of ‘meaning’ from one set of language signs to another set of language signs.” (翻译就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意义转换。)

—Lawendowski, 1978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Eugene Nida, 1982

What is translation? Often, though not by any means always, it is rendering the meaning of a text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e way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the text. (什么是翻译? 翻译就是(尽管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将原作者赋予原文本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Peter Newmark, 2001

Translation is the expression in another language (or target language) of what has been expressed in another, source language, preserving semantic and stylistic equivalence. (翻译是把第一种语言(源语)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语言(目的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

—Roger · T · Bell

以上只是中外译界对翻译定义的管中一窥。据统计,迄今为止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定义已达一百六十余种。翻译的不同学派对“翻译”的说法各异: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言语转换活动;文化学派认为翻译是社会文化的转换活动;交际学派则认为翻译是跨语言、跨社会、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不言而喻,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翻译的文化观扩大了翻译的外延,使人们透过语言看到了语言背后更丰富的文化内容。而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于是翻译的交际观又使人们超越了翻译的语言和文化层面,认识到翻译活动中译者与原文及原文作者之间、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交错的互动关系。伴随翻译实践的增加和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翻译的意义也将不断注入新的元素。

翻译的标准与原则

对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的探讨历来是中外翻译界的热点话题,在我国尤为显著。翻译标准或原则一直是翻译理论界的焦点问题,是翻译实践者不懈寻求的实践准绳,也是翻译批评家们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

至于“标准”与“原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二为一的问题,正如刘重德先生(1998: 14)所说:

“The so-calle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nd criteria of translation are actually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thing. The former lays emphasis on the translator, referring to w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follow while translating, whereas the latter on the reader or critic, who may use the criteria to evaluate a translation.”(所谓的翻译标准和翻译原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译者,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而后者侧重于读者或批评家,他们可以利用某些标准来衡量一部译作的好坏。)

中西方关于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提法很多,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标准与原则

根据罗新璋的总结,整部中国翻译理论可以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概念加以概括(王克友,2008:6),而这恰恰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的标准与原则发展演化的总结。

(一) 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标准与原则

支谦(约3世纪)在其《法句经序》中指出“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这里支谦强调佛经翻译应采用直译的方法。整句话的意思是:“翻译佛言要传达其意,不用修饰,要严格根据佛法。译者翻译经文,要使经文易懂,不失其本意,这样的译文才是好的译文。”

道安(312-385,东晋)在公元328年所作的《摩訶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学主张。其中“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为一失本;“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为二失本;三、四、五失本讲的是章法的删繁就简。“圣必

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或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以及“释氏弟子尚且慎重造经，现由凡人传译更难”的三不易。道安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

玄奘（600-664，唐朝）是中国三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他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即一方面要保持佛经的本义，另一方面又要通俗易懂，便于传播，换句话说来说，“求真”是为了“存信”，而“喻俗”是为了向读者靠拢，增加可读性。

此外，他还提出“五不翻”的翻译原则。所谓“不翻”，并非指跳过原文省略不翻，而是指在目的语与源语之间不需要或不存在完全吻合的对应词，所以直接采用音译，而不采用意译。因此，“不翻”指的是“音译”。所谓“五种不翻”，指的是佛经由梵文翻译成汉文时，在五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不翻”原则，即“音译”原则。这五项原则依次为：秘密故不翻、多含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五种不翻”是玄奘译经理论的重心，也是他为“翻译”设立的法则。“五种不翻”译论不仅成为历代佛学翻译家遵循的准则，而且对中西文化交往语境下汉英/英汉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二）严复（1854-1921，清朝）的翻译三原则

清代严复于1898年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信”者，其实就是忠实于原意，不歪曲，不臆造，能够正确地从源语（source language）翻译到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直至今日，“信”或“忠实”依然被视为翻译的首要原则。

“达”者，“通顺”也，应该扩大到句子、段落和文章层面，避免出现结构混乱、生搬硬套、逻辑不清的现象。

如：This song is the beginning of his fame.

A：这首歌是他的名声的开始。

B：这首歌是他的成名作。

译文A和B分别将“the beginning of his fame”翻译成“他的名声的开始”和“他的成名作”，若从字面看来，译文A更加忠实于原文，然而，汉语中很少会出现这样的表达，因此译文A就显得过于僵化，读来不够自然，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可；与之相比，译文B

显得自然通俗，避免了翻译腔，符合中文读者的表达习惯，因此更容易得到读者认可。

“达”是“信”的进一步，要是意思与原文不对应，再通顺也没有意义。所以，唯有忠实了原意，然后才能去考虑通顺。通顺的过程其实就是语言的再组织，而合理“再组织”的实现就要求译者能够熟练运用母语或者“目的语”了。许渊冲（1984：4-5）主张“翻译既要防止机械搬运的形式主义，也要反对想当然的自由主义……如果“忠实”和“通顺”发生矛盾，那应该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第二位，把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放第三位。”

“雅”者，即严复所说的“尔雅”“古雅”。这一标准在现代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要求译文的风格要与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以优雅、文雅、高雅为准绳。例如若将“*It happens in Hilton.*”翻译成“盛世聚首，尽在希尔顿”可谓佳作；而将“*The Merry Widow*”译成稍显世俗的《风流寡妇》似乎比高雅的《风流遗孀》更能吸引眼球；将“*Damned! Go to hell!*”译成“该死！见鬼去吧！”也不会因为言语粗俗而遭读者唾弃，相反，若是弄出个文绉绉的之乎者也，反倒是对原文的不忠实。

虽然“翻译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刘绍铭，1999：21），但是严复的翻译三原则在译界翻译标准中一直占据核心位置，后人在此基础上对这三个原则进行了继承、批判和发展。

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提出的“忠实、通顺、美”的标准，实则是对严复标准的继承与拓展。他用“美的标准”代替了严复“雅”的标准，认为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在《文学翻译十讲》（1984）中，刘重德提出了信、达、切“三位一体”的翻译标准。刘重德教授用“切”取代了严复的“雅”，因为他认为“雅”即所谓的“文雅”，而翻译不能拘泥于一种风格，应该实事求是，译作要“切合”原作的风格。“切”是个中性词，适合于不同的风格，这一标准吸取了严复三原则的合理成分，补充了其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了翻译的标准。

（三）五四以后的翻译原则与标准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的分水岭（张培基，2009：4）。五四以后，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作品，开始由我国翻译史上的先驱如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翻译财富，具有“五四”特色的翻译标准也应运而生；现当代翻译学者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各抒己见，进一步丰富了翻译的标准和原则的内涵。

1. 鲁迅（1881-1936）的“信顺”说

对于翻译标准，鲁迅主张“信顺”兼顾，在《题未定草（二）》中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针对过分意译而“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译、乱译，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原则，认为对异国语言文化的翻译，就要翻出异国情调。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瞿秋白赞成鲁迅的翻译准则，他还曾提出“翻译——除去能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直译”与“意译”争论的一个小高潮，而直译与意译之争在本质上是围绕着翻译原则进行的激烈讨论。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第一位，把忠实

于原文的形式放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忠实于原文内容放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许渊冲，1984：6）。

许渊冲（同上，7）认为，如果译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能表达相同的内容，一般可以直译。如果译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不能表达相同的内容，一般可以意译。如果外国语言的表达形式比本国语更精确，更有力时，可以直译，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鲁迅主张“信至上”的直译或“归化”，追求译文的“洋气”是“五四”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旨在“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

2. 傅雷（1908-1996）的“神似”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指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是神似。”他认为翻译任何作品，首先要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动笔。这正说明翻译的第一步——“理解”的重要性，没有对原文透彻的理解，就难以“表达”出神似的译作，也就得不到忠实的译文。

但是，对原作绝对的理解确实是很难实现的，康德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可以将翻译中的原文看作一种“物自体”或“自在之物”，译者代表了人的认识能力，而对原文的理解则相当于现象，产生的译文相当于知识。物自体不可知，因此对文本绝对理解和翻译都是不可能的。（王克友，2008：25）

3. 钱钟书（1910-1998）的“化境”论

1980年《读书》第二期发表了《钱钟书先生的〈旧文四篇〉》，文中说到：钱先生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许渊冲，1984：27）

“化境”即把原作翻译过来后，文字虽然换了，可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都不留痕迹地在译入语中传达出来，恰似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精神依然故我。这一化境说与其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不如说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翻译可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中国译界翻译的标准远不止这些，而且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的“文化转向”和“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影响，翻译的传统标准受到冲击，但基本上主流的翻译标准还是遵循“忠实至上”的原则（这里的忠实，可以首先理解为对原文“意义”的忠实，其次是“形式”的忠实）。

在“忠实”基础上的“通顺”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准，是影响译文可读性的重要因素，而对原文风格的再现则成为较高层次的翻译准则了。根据刘重德的观点，严格意义上的忠实其实是翻译三原则的泛化之说，是在内容、语言和风格上的全面忠实。也就是说，“忠实”是翻译原则的核心，是翻译标准的概括。

二、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标准和原则

西方翻译的主流标准与中国“不谋而合”，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泰特勒的翻译“三原

则”，奈达的“对等原则”以及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

(一) 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41): 翻译的三条基本原则

18 世纪末,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泰特勒在他的“*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971) (《论翻译的原则》) 中系统地提出了进行翻译和评判翻译的三条基本原则:

(1) 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译文应该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

(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一致。)

(3)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

不难看出, 泰特勒的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而且其影响也非常深远, 后来也同样成为诸多翻译家遵循的信条, 对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翻译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尤金·奈达 (Eugene A. Nida, 1914-2011): 形式对等 (formal equivalence) 和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 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 1964 年出版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一书中从语言和翻译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形式对等 (formal equivalence) 和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奈达对动态对等的定义是:

“Dynamic equivalence is defined as a translation principle according to which a translator seeks to translate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in such a way that the TL wording will trigger the same impact on the TL audience as the original wording did upon the ST audience. (Eugene A. Nida, 1982: 4)”

奈达强调, 动态对等注重的是原文意义的再现, 根据这一原则, 译者追求译文接受者对译作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对原作的反应基本相同的效果, 这一对等是“和原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在与查尔斯·泰伯 (C·R·Taber) 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69) 一书中, 奈达将“动态对等”改成“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认为翻译意味着交流, 强调读者反应, 判断译文的好坏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应的词义、语法和修辞手段的对比上, 而应关注译文读者对译文有何种程度的理解。

(三) 纽马克 (Peter Newmark, 1916-2011): 文本中心论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在其著作《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2001)) 提出了翻译的“文本中心论”。他在德国语言功能理论上根据语言的三大功能把翻译文本分为表达型 (expressive)、传递型 (informative) 和诉求型 (vocative)。

纽马克 (2001: 39) 指出, “根据 Bühler 所说, 语言的三大主要功能分别是: 表达, 信息传递 (他称之为‘再现’) 以及呼告 (呼吁)。这三大功能也是人类使用语言的三大主要意图……这三大功能分别强调译者对于原作者, 事实和读者的忠实。”

纽马克用以下图表展现了语言功能、文本类型的关系: